去仓库淘书，面对300万本书我不知所措

□ 城下秋

前几天，我尝试去一个存放着300万本书的大型库房淘书。

买书有许多种方式，一种古典的方式就是淘书。淘书的过程有点像淘米，只是淘米是从千万颗米粒中去除少数杂质，而淘书恰恰相反，是从汗牛充栋的印刷制品中挑拣自己的喜好。

早些年，北京在地坛公园举办地坛书市，一季度一次，这也是史铁生笔下“荒芜冷落的园子”少数的热闹时候。满京城的书商，再加上部分出版社的销售部门，都来到地坛设摊。每季度的书市大概横跨两个周末，用时髦概念来说，就像是书商和读书人合谋的一场“快闪”。

大书店、大出版社本来就豪横，它们占据有利地形，进门主干道上就能看到招牌，摊位面积也大，店员脸上一律是礼貌而克制的神情。小书店的摊主就是掌握最终定夺权的老板，可以攀攀人情、砍砍价，再不济也抹掉个零头。在一些主打二手书的小书摊上，还能看到一些绝版书和外文旧书，泛黄的书页等同于古典的端庄，岁月的质感跃然纸上。讲究的读书人一定会说，后者才是真正淘书的感觉。

地坛平时要买门票入内，书市时期也不例外。记得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凭学生证半价优惠，却没有占到便宜的感觉——买书还要门票，心里总有点疙瘩。不过，看到里面低价出售的书，尤其是三联书店等不太打折的出版社也摆摊以五折卖书，心里的不愉快情绪自然烟消云散。

对于当时没有经济收入的我而言，对书市是既爱又恨。爱，自然是因为买书便宜；恨，则是买书一不小心占用了太多生活费，以至于不得不过上一段拮据的日子。

后来，地坛书市不再举办。尽管另一处公园继续举办书市，却多少差了一点当年的热闹。原因自然有很多，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地坛本身无可取代的地位，在红墙绿瓦的皇家祭坛边逛书市，与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公园里买书，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视觉中国供图

当时，北大、人大等一些高校还会举办小型“周末书市”。来学校里摆摊的自然都是小书店了，虽然十几个摊头围成一圈规模不大，且主打商品是托福“红宝书”、考研宝典之流，但因为掺杂了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是能发现意外之喜。

记得当年从令人舒适而慵懒的新图书馆出来，回宿舍路上经过“学活”前面的小广场，只要不赶时间，就会驻足而立，顺手翻翻几本小说，也不一定买，也不一定真的想读，仅仅是沾沾旧书的质感便已满足。我毕业以后，周末书市的命运也不得而知了。

至于中国书店这般专营古旧书的书店，虽然留下了不少文人雅士的淘书记录，但日渐攀升的旧书价格，以及摆着“扑克脸”的营业员，实在让吾辈亲近不起来。那也许是藏书家的入门选择，而绝不是普通读者的目标。

书市衰落，淘书这种功夫自然濒临失传。虽说电商书店也能“淘书”，甚至不用担心袖子沾灰，但恕我直言，大数据推荐机制下的“淘书”，仅仅是有限而局促的投喂。在分析你的购书偏好和同类读者阅读习惯以后，平台轻而易举地计算出你“应该想读怎样的书”，却从来不会制造邂逅一本计划以外的书的感觉。而且，稍稍多逛一会儿，就能发现平台翻来覆去只推荐那几种销量高的书——反正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因此，最近，当一家图书电商网站决定开放仓库，允许读者在库房里自由淘书，而且以低于网络折扣的批发价甚至论斤出售的时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顿时让我感觉画风清奇，很快决定报名参加，哪怕仓库位于需要坐高铁抵达的环京“睡城”。

淘书的乐趣在于邂逅，或者就像一位体验仓库淘书的读者所言，“接收想找的书给你发出的讯号”。因此，当淘书活动组建的微信群里，出现读者希望工作人员帮助找书的需求，我对此是嗤之以鼻的。在网上买书，目的性强，直冲书单而去，这可以理解；但到线下淘书，总要顾及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体面，保留不期而遇的矜持。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仓库现场，并没有太多读者向工作人员提出找书需求。这多半也是因为平日冷清的仓库，多了几百名陌生的参访者，让工作人员忙于维持秩序、引导客流，而无暇顾及更琐碎的个性需求。

从车站出来，首先迎接我的是试图出售房产的中介，“高铁一站直达”是这个睡城最大的卖点。去仓库不长的路上，目光所及的远处，是大量入住率不明的高层住宅，眼前则是一排排厂房、仓库。此行的目的地就隐藏在工业区中间，按照指示，我很快站到了库房门口。

来说说入场时的感受吧。之前，大概很少有人领略过300多万本书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场面。一些大型图书馆的藏书量可能超过它，但绝不会提供几乎毫无阻挡的视觉体验。尽管当天是个气温骤降的雨雪天，库房里光线昏暗，一点也没有网红书店温暖整洁的样子，但在我眼里绝对是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画面。

就像千军万马奔腾，就像滚滚江水滔滔。不知如何用文字形容更贴切，但眼前的场景，一开始就让人不知所措，仿佛心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一样。

当真正进入库房后，我发现这与先前的任何淘书体验都不同。以前，不管是书店还是临时书摊，负责任的店家都讲究分类，比如学术圈赫赫有名的万圣书园，就以其分类独到著称。但在图书库房里，既不遵循大众对图书品类的通俗理解，也没有“中图法”这种图书分类学的羁绊，在非工作人员眼中，货架编号几乎没有规律可循。也难怪有人评价，这里是个目标感很弱的地方。

其次，在库房里淘书绝对是个体力活儿。在一般书店，同一种书至多不过百十本复本展示，一些二手书市更是“物以稀为贵”。而在库房里，我眼前的每一座小山，都可能是同一本书堆积而成。库房虽然没有宜家那么庞大，却只有付出足够的位移，才能勉强领略其冰山一角。

因此，与库房容量相对应的，是此次淘书的辛苦。这也颠覆了先前我所有淘书的体验——没有闲庭信步，更没有书友之间的切磋交流，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穿梭于货架或书山之间，只为简单浏览书脊上的名字，然后在数秒中快速决策是否抽出一本放入小推车。

因为还要坐高铁回去，在近4个小时里，我仅仅逛完了前两层，遗憾与第三层的外文原版书失之交臂。即便如此，在积攒了上万步运动量以后，紧接而来的是头昏脑涨，那种仅仅因为浏览书名而产生的疲惫。如此紧张刺激的信息筛选和过滤，上一次可能发生在我高考完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

与线下书店的营销对象日益分众化不同，这次淘书活动的顾客来源多样，让我充分感受到买书风格的激烈碰撞。比如，在交流群里讨论最热烈的是几位妈妈，她们并不是为自己选书，而是为孩子挑选读物，因此按斤售卖的外文童书是她们的最爱。而她们的对话，很容易让我脑海里生成焦虑家长的画面，毕竟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读过外文版童书，也完全不能理解在孩子有限的童年阶段如何消化这些成筐购买的书籍。

有人调侃，这样的库房淘书活动应该定期举办，努力打造成为“6A级”旅游景点。对此我倒是深以为然，算上来回的高铁票钱、午餐费用，对于顶多买几百元的普通消费者来说，仓库相比网上的额外折扣，其实已经微不足道。不过，一个爱书人又怎么能抵挡300万本书凝聚起来的气场呢？就在我参加的同一场活动中，就有内蒙古读者不惜换乘高铁并提前一天找附近宾馆住下，这样的跨省淘书也是令人感佩。

如果书会呼吸的话，库房淘书活动的乐趣不是买到几本书、把它们请到家里的满足感，而是与这么多的书呼吸同一片空气的震撼。类似的美学震撼，大概只有10万人的团体操才能比拟。

幽默的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没办法把自己购买的一箱子书随身带回去，纷纷选择平台提供的快递服务——以一种互联网的方式解决了库房淘书的遗留问题。那个因为活动而建立的微信群，我相信能够让读者们保持更长久的联系。

不管怎样，如果还有这样的淘书机会，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哪怕仅仅是为了和300万本书拍一张合影（下次记得带上超广角镜头），也足以让一个爱书人感到莫名的满足。

追随一场迷人的生命之旅

□ 邓安庆

每次去日本，我都要专门去吃一次鳗鱼饭，那被炙烤得香气四溢、酥软可口的鳗鱼块配上香甜的米饭，就如同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所言：“只闻鳗鱼味就足以配饭。”但我并未亲眼见过活的鳗鱼，也完全不了解这种鱼类。

《鳗鱼的旅行》可以说是帮我补了一课。在看《鳗鱼的旅行》之前，我对此书有小小的误会：这可能只是一本科普类图书，介绍了鳗鱼这种我们爱吃的鱼类。当然书中的确有这部分内容，但全书给我最大的阅读愉悦感来自作者由“鳗鱼”引发的哲理性思索和亲情回忆，它是集自然书写、科学史、父子回忆录于一身的独特作品。

本书作者帕特里克·斯文松，生于1972年，《南瑞典日报》艺术和文化记者，现与家人一起生活在南瑞典的马尔默。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为何处女作要以鳗鱼为主角？原因有二：一个跟他的国家有关，众所周知瑞典是一个渔业大国，有着悠久的捕钓历史，而鳗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瑞典南边的斯滕斯角一直到北边的沃姆胡斯，有一条40多公里长的鳗鱼海岸，专门的鳗鱼渔民在此以捕捞鳗鱼为生；一个跟他的父亲有关，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家附近的溪水边捕捉鳗鱼，父亲教他如何用无钩法钓鳗鱼，鼓励他勇敢地游过湍急的河流，跟他开有意思的玩笑……父亲的爱从未言明，却以一种深沉的方式让作者感念至今，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鳗鱼。所以作者选择写鳗鱼，一方面是对鳗鱼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内心深处情感悸动的抒发。

作为本书主角，鳗鱼是一种神秘的生物。它出生在大西洋北部的马尾藻海，性成熟的鳗鱼在这里产卵并让其受精，随后这些新生的小鳗鱼，跟随墨西哥湾暖流，在大西洋里穿越几千公里，朝着欧洲海岸的方向行进，耗时3年时间，游入江河溪流，选定地方栖居下来。如此生活几十年，生物钟当当当敲响了，它们不安分了，要蜕变了，消化器官消失了，繁殖器官长出来了，然后踏上了返回马尾藻海的漫漫归途。够折腾，够忍耐，一路上不吃不喝，就是要回到老家完成繁殖任务并死去。新的一批小鳗鱼又一次开始出发了……鳗鱼的生命史看起来一切简洁明了，但其中蕴藏着非常多谜题。

鳗鱼到底是什么动物，其实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弄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也常常给人们带来一种疏远感。如作者所说：“人们害怕鳗鱼，或者厌恶鳗鱼，它们黏糊糊的，身子扭来扭去，长得像蛇一样，据说会吃人的尸体。它们在隐秘处、在黑暗中、在水底的淤泥里活动。鳗鱼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无论它们分布如何广泛，在我们身边的水域里和我们的餐桌上多么常见，在某些方面来说，它们对我们而言一直是一种陌生的生物。”

千百年来，无数科学家都在研究它。比如亚里士多德，作为人类文明早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观察和描述自然的先驱，他认为鳗鱼都是从淤泥里诞生的，它们就是如此“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不遵循通常的繁殖规则，不是由其他鳗鱼交配出来的，仿佛一种扭动的、神秘的奇迹。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亚里士多德这个结论可以说是荒诞可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通过实际的研究，切开鳗鱼身体，观看内部，寻找卵和生殖器官，才有此推断。另一个科学家也在鳗鱼这里栽了跟头，那就是我们熟知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岁时的他勇敢地接受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留下的挑战，寻找鳗鱼的睾丸。他日复一日地坐在实验室的桌旁解剖鳗鱼，在显微镜里记录结果、寻找谜底。可是做了400次观察后，现实击垮了他——他还是没有找到鳗鱼的睾丸。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是：世界上少了一位鳗鱼专家，多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还有千百年来前仆后继的科学家们……他们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类，却奈何不了这些小小的鳗鱼。正如作者所言：“自然科学界有很多谜，但很少像鳗鱼之谜这样持续这么久，这么难以破解。它们不仅观察起来异常麻烦——因为它们奇特的生命历程、怕光的特性，以及数次变身和繁琐的繁殖方式，而且还非常隐秘，它们的行为方式既像是有意识的，也像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我们成功地观察到了它们，即便我们凑得很近，它们似乎仍然溜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经历去研究鳗鱼，试图理解它们，我们理应比现在知道的更多。可我们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为何会如此，这仍然是个谜。在动物学界，这通常被称为‘鳗鱼问题’。”

鳗鱼问题折射出的其实是“所有生命从何而来”的谜团。作者在讲述了诸多科学家研究鳗鱼的得失后认为：“我本人对鳗鱼了解得越多，对历史上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了解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信这一点。首先我愿意相信，人们被神秘的事物吸引是因为其中包含我们熟悉的东西。尽管鳗鱼的起源及其漫长的迁徙之旅非常奇特，但我们也可能产生共鸣，甚至觉得似曾相似：为了寻找家园，在海洋上进行漫长的漂流，回程时还更加漫长艰辛——为了找到自己的家，我们愿意做的一切。”

我觉得书的迷人之处在于此。作者不只是在讲述鳗鱼身上的谜团和古怪又浪漫的生命之旅，还以此为跳板，更深地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鳗鱼之所以如此让人着迷，是因为它处在信仰和科学的交叉地带，提醒我们人类的知识还没有完善到可以解释它的程度，所以无论神话、寓言还是小说，都有可以发挥想象的余地，那些相信科学和自然规则的人，偶尔也愿意为这个神秘的小东西打开一道小小的缝。作者为此考察鳗鱼在科学史、文学、宗教中的形象，读来颇有意思。

总的来说，《鳗鱼的旅行》是一本难以定义的书。它是科普，也是散文，还是哲思集，既有生动有趣的科学家掌故、严肃深刻的哲学思考，还有优美动人的情感描述……或许可以称它为随笔集。英国著名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好的随笔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心有所感却无法明白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恼怒、罪恶感——有时候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油然而生，从而产生“何等幸运，得遇此君”的感慨。可以说，读《鳗鱼的旅行》一书，我的确由衷地生发此等感慨。

科幻作家陈楸帆：2020思考了什么

陈楸帆参加“科学脱口秀”X-Talk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陈楸帆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孤儿》，300年后人们的脸蛋因为基因编辑，通通都变得特别完美。所以当大家看到一个“面瘫”的人，觉得他长得很真实，很有特点，就把他奉为坐上宾，于是一个原本备受冷落的人，瞬间拥有了贵族般的地位。这个故事，陈楸帆最近在一场科学脱口秀中提起。

手持基因“剪刀”的裁缝们，会剪出个怎样的未来？假设未来基因编辑成为一项被广泛商用的技术，它运用的边界是什么？日前，在腾讯的科学脱口秀X-Talk对谈中，科幻作家陈楸帆、中科院研究员王皓毅、科学脱口秀演员张宇识就今年备受关注的基因编辑技术，“脑洞大开”进行探讨。

陈楸帆笑言，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要传说中的“老板基因”——每天睡4个小时就足够。“但如果成真，基因编辑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陈楸帆的代表作包括《荒潮》《未来病史》《薄码》《深瞳》等，他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奖等国内外奖项。

这样一个作家，曾经在一家专注于动作捕捉技术及虚拟现实领域的公司担任副总裁。所以很多人评价，陈楸帆是最接近核心科技的科幻作家。

“科幻作品只是一个筐，里面可以装下所有的东西，我对人类，对宇宙，对各种东西都充满好奇心。现在好奇心比以前更强了，因为我知道得更多了，但问题也更多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科幻作家陈楸帆如是说。

陈楸帆说，他现在和李开复共同创作一本科幻故事集《AI 2041》，明年中英文会同步出版，讲述的是20年后AI如何改变社会的故事。“整体基调都是比较积极光明的，AI赋能给人类，我们探讨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相关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很多人说你是科幻作家里最接近核心科技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陈楸帆：接近核心不敢说，因为毕竟我没有编程技术，但确实在科技公司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这给了我很大的便利，能理解一个技术怎么样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一个影响亿万用户的产品。

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前一个中国互联网发展期，收购红利，互联网渗透率从无到有，移动终端从无到有，增速非常快，曲线非常陡峭。到了现在，曲度开始缓和下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怎么样在互联网渗透率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挖掘这些市场？包括你的技术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让每个人不会成为困在系统里的人。

现在为什么都提“科技向善”？不在大公司里，人会凭空想象很多东西，把科技公司想象成邪恶的存在。但如果在科技公司里跟这些做技术的人做产品的人交流，你会知道大家的初心都非常良善，只不过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走偏，包括绩效主义、工具理性等东西。所有这些给我的创作更好的灵感，能写得更加真实，也会想得更加深刻。但反过来我现在要影响他们，我会把创作科幻作品过程中的一些想法跟他们进行交流。下一个阶段我们的互联网，我们的科技，我们的AI，要往哪个方向走，是不是更重视人在里面的位置、价值、尊严？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互相促进，互相融合。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因为科幻电影爆红，科幻作品好像成为一个风口一样，你会怎么样看这个热潮？现在的创作是否能支撑起受众的期待？

陈楸帆：整个电影工业还是不够成熟，工业化的程度还远远达不到大众的期待。因为大众期待的是一年可能出来20部《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但其实做不了，因为只有一个郭帆，只有一个郭帆的团队。

现在问题不是有多少好的故事值得被改编，而是缺少改编、制作的这种能力。归根结底还是说科幻需要一个土壤，这个土壤是慢慢培育起来的，需要有一帮这样的科幻迷进入各行各业，变成中坚力量。

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开头，但这样的体系需要慢慢建立起来，希望接下来有更多创作者，各种资本，包括做电影特效、概念设计等方方面面的公司参与进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仅靠一两个人，一两个作品，完全没有办法撑起整个市场。

中青报·中青网：你希望整个工业流程是怎样的？

陈楸帆：我们电影工业长期是手工作坊的状态，一个人带着一帮徒弟，只要师傅在徒弟就可以干得像模像样，但师傅一走或换一个师傅，这些人可能做出来的动作完全比不上原来的一半水平。这就是手工作坊的情况，不是一体化，没有规则，不是职业化的过程。

职业化的过程是像好莱坞一样，漫威大片很多导演都是原来拍情景喜剧或者小文艺片的导演，但你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整个团队就会围绕他转，所以这种概念设计、编剧，到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全都是工业化的流程，就算以前没有拍过，依然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有甚至更高的水准，这就是工业化的能力。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够批量生产优质的重工业的科幻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疫情对你的创作产生哪些影响？

陈楸帆：因为疫情减少了很多出行，有很多时间进行创作，今年写了很多东西。在疫情期间得到很多信息，可以思考，疫情本身也是很大的隐喻，包括人类和自然、科技和生态等等关系，都是科幻里经常会探讨的一些议题，所有这些都会变成我灵感的一部分。今年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特殊年份。

中青报·中青网：现实生活体验和你的创作是如何关联的？

陈楸帆：日常生活里基本上点点滴滴都会影响创作。比如我和参加X-Talk的几位嘉宾一起吃饭，有做基因编辑的，也有在学校里教书的。你理解每个人对技术不同的观点，包括他们自己在做的一些实践，这都会变成我写作中灵感的一部分。我不想简单粗暴地把一个东西，比如基因编辑，归结为到底是好或者坏，这样太二元了。

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大家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所有问题都简单粗暴地分为对和错，是与非，很多问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通过作品传递的是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传递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这些年，心境有何改变？

陈楸帆：思考越多，最后会发现没有唯一的答案，所有答案都会随着你对世界认知的深入发生变化。你知道的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

怎样让孩子不奖

□ 闫 晗

养育孩子是件困难的事，这导致当妈成了一门“显学”。发表意见指导别人怎么当妈比较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不比读博士容易。虽说为人父母时未经过考试，可那之后的考试没完没了。比如说，你想要眼前的效果，还是考虑长远的发展？

我妈教育孩子喜欢用“贿赂”的方式：背下这首诗，给你玩10分钟手机，还颇为得意：你看，有了奖励之后，5分钟就能背下来了，否则能磨蹭半小时！

我觉得这样做虽然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存在隐藏的弊端，比如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以后若是没有奖励，再让孩子学习，就难了。凯瑟琳·雷诺兹·刘易斯在她的新书《不奖不罚：如何让难管的孩子拥有自控力》中探讨了关于传统的奖惩教育问题，并指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当下的孩子自控力越来越弱？

凯瑟琳说，一位爸爸告诉她，罚站很有用，他们家4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因为害怕被罚站，就不调皮捣蛋了。她的回应是，即便现在看上去有用，但这种模式从长远上来说，不一定行得通。“你到底有没有教给孩子那些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东西呢？还是仅仅在用惩罚手段逼着他们更加小心、好在以后犯错的时候尽量不让你抓到呢？”

不奖不罚的养育方式，才能真正帮孩子找到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许从眼前看来，能让孩子在数学测试里考个好分数，能背下更多的古诗，能把作业完成，最为重要，但是从长远来说，学会让孩子变得负责任、有担当、有条理，比考个高分有用多了。

《不奖不罚》一书中提出家长要积极沟通，确立界限，不包办、少命令，运用共情式聆听，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反而比积极干预来得有效。成年人必须放弃对结果的控制，让孩子自然地感受生活当中的起伏，承担行为的后果。比如说有一天天气很冷，但孩子不想带外套出门，如果唠叨到孩子妥协，或是等到孩子感冒之后再来一句“不是告诉过你了吗”，那么孩子关注到的就只是家长有多讨厌，会把精力集中在跟父母对抗上。如果孩子自己受到教训，而家长却什么都没说，那么下一次降温，他反而可能会自觉带上外套。通过亲身经历得到的教训，影响更持久。

如今的社会现实，普遍是孩子基本上没有机会跟玩伴协商问题、解决矛盾、学会控制情绪，而这些技能对整个人生来说非常重要。为了安全和效率，从幼儿园起就是在大人监管下跟别的小朋友玩，参加有人看管的课外班，时时刻刻都有大人在监视，有矛盾就马上调停，随时准备干预，孩子们没有机会锻炼与人交际的技能。凯瑟琳反思了一下，为了能让孩子体验随意玩耍的乐趣，并在玩耍中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停掉几个孩子的课外活动班。她觉得这些比具体的知识重要。

做父母的学问太多，压力太大。书中也宽慰大家，作为父母，不是神仙，不能总想着时时刻刻都要说出最完美的话语，也不用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作出最正确的选择。普通人都是状态好的时候才有耐心，状态不好时不冷静。但状态不好并不值得羞愧，而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孩子们展现要怎样道歉，以及如何弥补自己的错误。当然，如果能够在发脾气之前及时刹车，就又获得了一个锻炼在5分钟之内平息情绪的好机会。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课堂，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时时刻刻都有学习和进步的机会。